



LUND UNIVERSITY

(The State of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choenhals, Michael

Published in:

文革四十年祭—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In Memory of the CR: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2006)

2006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Schoenhals, M. (2006). 国外的文革研究情况(The State of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J. Hao (Ed.), 文革四十年祭—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In Memory of the CR: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2006) (pp. 141-145).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Total number of authors:

1

General rights

Unless other specific re-use rights are stated the following general rights apply: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Read more about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LUND UNIVERSITY

PO Box 117
221 00 Lund
+46 46-222 00 00

In Memory of the CR: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2006

文革四十年祭 — 2006 · 北京 · 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

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P. O. Box 185393, Fort Worth, Texas 76181-0393

Copyright © 2006 By Ding D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3447-14-1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 2006

Edit by Hao Jian
Cover by Li Gelang

Web: <http://www.fellowspress.com>
E-mail: mailmaster@fellowspress.com
Tel/Fax: (928) 396-8130

溪流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 禁止翻印, 转载, 复
印, 改编, 违者必究。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美国溪流出版社) 出版的
切作品均不代表本社立场

文革四十年祭

—— 2006 · 北京 · 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

整理、编辑: 郝建



溪流出版社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行了升级，增加了一千多份新的文献。

宋永毅等人的工作是一种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1998年，他就和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他收集出版的《红卫兵小报》（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3辑，共达112卷，包括了2,700种小报，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也要在今年出版。宋永毅还和孙大进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他还主编了《文革大屠杀》。另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学者王友琴对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单独一人进行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录文革中受难者的个人情况。她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文革受难者纪念馆”，很多读者通过访问这个网站面了解文革的真相，关心文革这段历史。2004年她把自己的成果汇编出版，书名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据我所知，今年在海外已经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还有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白述》，即将出版的有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以及刘国凯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

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几年前就发表评论说，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我为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文革学的研究已经回到中国”这个论断具有阿Q意味，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已经是美国公民，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们能够享受的思想、言论、出版、交流自由的条件，才使他们的研究能够进行，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发表。

三天前，即3月22日，我和几位同行参加了另一个纪念文革的小型座谈会。会上主持人郑仲兵先生问何蜀，他认为最近十年文革研究的突破在什么地方，何蜀认为在研究和重新认识林彪、周恩来这两个方面。我补充说，文革资料的系统收集和积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在

2006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西藏作家唯色的两本书《杀劫》与《西藏记忆：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使世人得以对西藏的文革有所认识，而弥足珍贵的是，《杀劫》是一本带说明的照片集。

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一一列举在座各位在研究文革方面的论著和成就。我想指出，除了到会 and 没有到会的学者专家，对于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贡献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退休干部应山红主编和自费印刷了一本《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他在几个月前寄送我一本书，并应我的请求又寄送我几本，由我分送给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

我在这里谈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不是想和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一争高低，我强调的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既然我们不幸经历了文革或者生活在发生了文革的国度，我们就像摆脱不了自己的命运那样摆脱不了与文革的关系。

沈迈克：我介绍一下国外的研究文革。国外最初对文革感兴趣、开始研究的是两类人，一是大学中有关学科的学生或教师，二是专门研究中国的一些机构。但是，他们并不是把文革当做历史来研究的，而是当正在发生的现实去研究的，应该说，这种研究不属于文革史。国外什么时候开始把文革当作一个结束了的历史开始研究的呢？应该说是“九大”以后。你如果仔细看看“九大”以后的《中国季刊》，就会发现，从那时起，撰稿人开始用过去时来写文革。也就是说，在1969年以后文革才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所以在70年代初，国外研究文革的人基本上是把文革当作一个了结了的阶段来看待的。我也是后来才慢慢地接受现在普遍使用的十年文革的说法。但是70年代初出的书，一直是把文革看做只有三年的。

刚才徐友渔提到关于文革的早期的、宣传性的书籍，我想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情况。70年代在国外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其信息、资料来源相当困难。这些资料主要源自三方面，其一是当时的官方宣传。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国际上做得最好的时期就是文革，在国外，起码在欧洲，关心中国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相信《北京周报》、

《人民画报》上发表的东西。其二是小报，那个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搜集小报这个工程从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像徐友渔他们后来做的那样。国外在小报上搜集得比较全，后来以胶卷形式发表。其三是逃到香港的人。主要是南方人，大部分是从广州出来的。当时美国的大学资金比较充足，他们的很多研究生都到香港“大学服务中心”（那个时候还不是在中文大学，而是在香港岛上）采访那些刚出来的中国人，凭他们的讲述做研究。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就不是一个热点了。从当时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有关文革的文章的数量很快下降了。因为原来对文革感兴趣的都是搞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他们关注眼前的事，对历史不感兴趣，文革一结束，他们就迅速地把研究方向转到文革开放上面去了。所以从80年代以后，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文革的论著，也没有像原来那么多人研究文革，文革研究成了一个冷门。这个时期唯一一本比较重要的、有关文革的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91年出的英文版，中文版好象是92年出的。直到90年代末，一些大学历史系的人开始对文革感兴趣，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时期来研究。

应该说明的是，在欧洲和北美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学里面研究中国历史的归历史系，历史系研究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那么49年以后算不算历史，归不归历史系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也就是说，从1978年到90年代，国外大学没人管文革这块。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意识到：可能50年代也是属于历史系的，可能60年代也属于历史范畴，可能文革也应该这样归属。文革这才找到了归宿——逐渐归历史系了。这是一个新的、可喜的现象。美国加州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哈佛大学、伦敦亚非学院等等，教中国历史的教授，现在都开始讲文革史，把它当做该讲的历史。另外，他们的一些比较年轻的研究生也开始围绕文革的专题去写博士论文，虽然现在史学界还没出多少新著，但仅就我所知，现在以文革为题目的，国外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就有那么好几篇。我估计，在两三年内你们会看到国外相当好的文革的专著，这是跟过去国外的文革研究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研究者的取向。以前的研究重理论而轻史

料。造成这种情况是两个原因，一是以前研究文革的，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社会科学的，他们经常把西方的一些政治学理论套到中国的实践上去。二是当时的研究者接触不到多少第一手的资料，他们身在国外，也不可能去挖什么资料。现在的研究是重理论而重史料。现在搞文革研究的往往是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生，他们可以进入中国，待上半年或一年挖一些资料。他们不想为他们的著作套上多少理论的东西，只想弄清楚到底在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说说刚出的和将出的著作，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Andrew G. Walder 正在写一个北京高等院校的文革史，他用了很多史料，想否定过去关于文革中分成两派的原因的论点。此书可能明年出版。

另外，Andrew G. Walder 和加州大学 San Diego 分校的两个教授一块儿辅导的一些硕、博士研究生出了一本论文集——《作为历史的文化》，这本书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的，代表了新的学术成果。此外，哈佛大学的 Elizabeth Perry 刚出了一本书，虽然讲的是中国民兵史，但是其中有比较长的一章专门讲文革中的工人民兵，这本书也比较有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8月份，哈佛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我和麦克法夸尔合写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叫做《毛泽东的最后一场革命》。我们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全书688页，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师生。现在在英语世界里没有一本较新的全面论述文革十年史的书，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文革的兴趣。

不用英文发表东西的，像法国人、德国人也在研究文革，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太多，主要是一些论文。

崔卫平：他们的介绍都是比较概括性的，大家可能想了解更多，那么我们吧讨论的时间放宽一点。每个人提问和回答都不超过三分钟。

赵诚：我想向沈迈克先生提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吗？

沈迈克：也许我对“革命”的理解跟你们不一样，我说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算革命，不然它算什么？

赵诚：它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运动，这个政治目的首先是为了个人

巩固权力，其次它可能是要把权力传到毛家手里。他为什么要不停地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最后要传给江青，之后把毛远新作为和江洪文同等的一个人接班人。

沈迈克：因此你认为这就不算革命了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赵诚：我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农民的乌托邦，他的文化大革命，谈不上是一个革命。因为他取得全国政权后，逐渐以乌托邦为立国旗帜，所以文革只能打着这个旗号，对付党内高层政见不同的人，实际上是要进行一个政治上夺权的斗争，最后是要传给他们家，维持一个毛家天下，如果不是江青政治上的恩益，或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毛岸英在世的话，他传位就成功了。

沈迈克：我在这儿不可能把我们那本书的观点全部阐述出来，再说我只是作者的50%，另一个50%——麦克法夸尔不在，我也不敢说得太。在英文里，“革命”有很多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折腾”，从这个角度讲，你不能否认文革是“革命”——八亿人的折腾。

徐友渔：我觉得根据我对“革命”这个词的理解，英文中“革命”这个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的语境中要把革命赋予某种神圣的，至少是正面的意思，实际上没有这个意思。中国官方谈文化革命是要加引号的，加引号甚至加到这种地步。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证的是毛主席的语录，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现在的编辑都不动脑筋，他看到文化大革命就一概机械地加引号，他加了引号以后的意思就变成毛主席自己认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荒唐到了这个地步！最近宋永毅帮助出周伦佐的书，作者也把文化大革命加引号，可见我们很多人都受官方影响，我就跟他不能说这样做，所以我现在写文章和出书，文化大革命都不加引号，就是一个革命，没有把神圣或者正面的意思加给这个词。

郝建：我的问题是想问徐友渔，除了专家学者把文革作为专业的研究之外，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大学里面、网站、老百姓，那些不是专门的文化研究者的，他们对文革言说，对文革的谈论，对文革的看法等等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关注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对文革的看法，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变化或者倾向。

徐友渔：这个时段最开始有一个例子，大约在1967年有一个青年学

生鬼水到金门去，投奔国民党，在台湾开始写文革的回忆和介绍，他出示了一些照片，什么中国大陆用的粮票啊、领袖照啊、红卫兵袖套啊，等等。这种情况海外中国人写文革回忆录的很多，像沈迈克说的那种情况很多，有一大批人在运动后期受到清算，他们就逃出去，而且逃出去的一般是文革非常有经历的造反派，所以给海外研究文革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研究者要研究文革就去采访这些人，出了大量的文章，最多的就是回忆录，比如高原的《自来红》这一类的书，或者是国际上很有名的张戎的《鸿》。

郝建：再问一下，作为学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他们不一定是研究文革的专家。他们对文革的评价和言说，这几年有什么变化？

徐友渔：这点我觉得沈迈克说得非常好，是让我们很丧气的。实际上70年代一过，文革研究就是一个低潮了。一些最好的学者都改行了，比如最好的一个韩国的研究文革的学者 Hong Yung Lee，他中文名字叫李鸿永，现在就改行了。陈佩华现在每年也到中国，她研究中国的社会、研究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的政协。她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陈村》，就是到村庄里去做社会学调查。最优秀的一批人，全都改行了。可能他们觉得文革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好研究的了。就像沈迈克所说的，他们的专业本身是政治、社会、经济。这些研究者都走了。除了最后他说的那个新的苗头之外，中间有大段时间，是冷场和空白，都没有了。中国人在外面写东西也没有，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实际上热闹到80年代初，后来就没有。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为文革在海外是奇货可居，以为一本书出来，外面会怎么样注意，以为有很多的稿费，像聂元梓等人，他们在外面出回忆录困难死了。我们这里是很大一个事，别人根本不当一个事，海外出文革研究的书困难得要死。香港、台湾没有什么人管你这些事。

吴小龙：我对沈迈克提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你和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合写的那本书是以大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你能不能说一说，这个设定对你们的体例、内容、观点有没有什么影响？

沈迈克：当时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原因是，麦克法夸尔在哈佛教文革史，他需要一个课本。可是没有课本，只能用一些书的复印件、文件

和其它材料，后来我们认为需要一本满足各种学生需要的书。因为这本书要在大学当做基本教材，所以就用了比较严格的注释，凡是所有比较重要的材料，我们都要有第一手资料，都要注明出处。我们尽量不用叶永烈一类人写的纪实文学之类的书，这类书都不用，顶多当参考。我们比较注重最近几年出的、有关当事人的书，比如王力的、聂元梓的、徐景贤的。我们对文献研究室出的书，如《周恩来年谱》也比较重视。我搜集了一些当时的油印小报、动态报。我们用的史料比以前国外出的书要可靠一些，文笔要通俗一点，同时我们也找了一些别人没有用过的照片。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很有市场，对中国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会爱读。

所以此书成了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他们认为写得比较通俗，但是历史方面又比较严格，尽管它不是《鸿》、《高原之梦》那样的普及性的读物，但是也可以放到机场的书店那一类地方卖。我们希望能出一个中文版，但是这事不好说。

徐友渔：这点我来补充，关于文革的系统介绍的书籍，第一本是高泉和严家琪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海外有两个英文版，其中台湾译本先出。但是西方的学术界对它们评价不高。我记得90年代在《中国季刊》上有一篇专门对此书的书评，作者叫切克（Tomothy Cheek），那个书评认为，严家琪、高泉的书的总体框架非常陈旧，第一编讲毛泽东，第二编讲林彪，第三编讲江青，完全是陈旧的中国史学界的套路。西方人一般喜欢从社会开始讲，那种宫廷斗争式的东西，西方人认为很不好。第二那本书搜集的东西，是传单、小报，很多是不可靠的。第三他们没有任何注释，这个作者对这本书提出致命的批评，认为它学术性不高。最后他的评价是，如果要在历史课堂上讲文化革命，可以作为一种引起学生感性兴趣的东西，迈克的这本书是可以作为教科书的。本书，那两本书十多年前就有英文译本了，西方学界没有把它当做一本学术性的书来看待。

陈家琪：说说对革命这个词的理解，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可以称为革命，他还是想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他要为这种革命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从建国后他就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每一代王朝都在想这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国家也在想这个问题，而且认为问题一定出在身边的

人身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几乎就是规律。毛泽东与中国历代王朝不同，也与斯大林不同，他想找到新的形式。三反五反一系列的运动都想解决党内的问题，但都没有解决，找到文革这种形式依然是要解决他心目中的问题。革命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从基层、从下面搞起，一个是最广泛地动员群众，能持续相当的时间，再就是带有某种程度上暴力性，这就是对革命的一个最一般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合乎这个定义的。我们这些文革的参加者也是这样理解武斗、理解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革命的目的是解决权力的归属问题。但除此之外，毛还想着后来的共产党人提供一种模式，以此解决执政党的“变修”。毛泽东想解决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搞掉几个人。他就是想找到一种新的革命的形式。不管我们赋予革命什么含义，但那种局面以及最后的结果就是革命。至于结果的好坏、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文革前的所有运动以及抓四帮就不能算革命。这里就只涉及的是形式。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就是毛相信他能控制住局面，尽管在很多方面也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

那小群：我想问一下沈迈克，你是从教学当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问题来写这本书，那么国外的学生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兴趣？

沈迈克：国外的学生跟中国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完全不了解文革。我上个月去天津南开大学给历史系学生讲课，从学生提的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国外的学生对文革也很奇怪，他们觉得好奇、觉得莫名其妙。最近有一些人，从文革时期的文化角度来谈毛泽东的像章，谈当时的艺术作品，他们搞一些宣传画，搞了几次展览。但是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解释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他们就讲艺术，跨时代、跨文化、跨国界地比较。他们把文革说得好像挺好玩儿的：你看，多大的像章啊，多好玩儿啊！他们完全虚掉了当时的语境——如果有谁把毛的像章弄碎了，那他就犯了罪，就要倒霉。我对这种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完全从美学的角度来谈文革艺术会误导年轻人。年轻人会认为，文化大革命再搞一次也没什么不好。我在哲学系、历史系讲文革的时候，总是先摸一摸学生们的观点。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偏右，我就往左拉一点，如果他观点偏左，我就把它往右拉一拉。你可以说我是机会主义，可以说我中庸，没关系，我喜欢中庸。

我的任务就是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了解真正的文革。我会尽量去告诉学生，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反应如何；那儿又发生了什么事，反应怎么样。我们希望让你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你看完了以后，自己来判断，如果你糊涂了：怎么两个人说得不一样？那你就继续研究，找别的书看。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我们就是想引起你的兴趣，让你知道历史没那么简单，比这复杂得多，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给结论，比如林彪事件，因为我们确实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给你两种说法，我们会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说不清楚。如果公布了新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总之，是让学生、让读者多思考一下。

那小群：卡玛·韩丁的那个记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在学生当中放过，感觉效果很不错，因为它有一个脉络，这一代人的精神文化当中，导致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状况。学生看完了以后起码知道来龙去脉是这么回事，而且对文化的破坏性，对好多现象他们也感到很震惊。

徐友渔：如果对西方关于文革的教学感兴趣，我补充一个有趣的情况。1987年我在牛津大学，我太太在哈佛大学我去探亲，正碰到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讲文革，他的文革课有名得不得了。我们在牛津知道，一门课有二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经常就两三个人这种情况都有。我第一次看到，在哈佛大学上文革课，一个大厅至少有五百人，像这种摄像机摆着好几架，前面第一排有一二十人是杜维明教授的助教。那种情况在西方大学很难设想，就是一个大电影院那种大礼堂，座位六、七百，三、四架摄影机，二十来个助教坐在旁边，就是这种情况。听说杜维明在哈佛讲文革讲了这么几年，这在西方是个不可思议的盛况。我当时很感兴趣就去听，他口才极好，英文也极好，但是他讲的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对文化大革命像我们这样研究他没有做过一天，他专长就是孔夫子儒家学说那一套，他原来是讲国学的。杜维明完全是凭脑袋里的哲学概念，推演出一个文革。他可以一学期一学期地讲，每一个学期的课堂都是爆满，他可以有一二十个助教，都是三、四台摄像机这么讲了几年，但是我听下来觉得很奇怪，我研究文革的时候，从来没有把杜维明当成一个研究文革的专家。这件事特别可笑，他是一个标准的

中国哲学家，中国儒家思想的人，他可以在哈佛大学讲三年，每年都是这么盛况空前。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杜教授没有一本文革研究的书，没有一篇文革研究的文章，没有做过文革的一次访谈。不过他的课也说明大家对文化大革命很感兴趣。

吴小龙：我发现与刚才说到的西方学生有很大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对文革虽然也好奇，也想知道，说到文革他们的了解比外国学生多一点，也许或多或少可能从父母处听到一些，但是兴趣重点跟外国学生非常不一样。他们兴趣的重点不在社会那一层，不像迈克所说的西方孩子，也许因为一些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的影响，他们乐于关注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文革，如运动中社会上下层的互动——对立、沟通、交流、影响。我们的学生对这一层面基本不感兴趣，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上层的宫廷权术史。这个现象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陈家琪：我想问一下沈迈克先生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家有一本英文书，名字叫《大街上的革命》或《行进在大街上》，记不大清楚了。好处就是它几乎每个月都附有几张图片，说明同一时间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放在其中，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们的研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时期，普遍的世界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法国68年的5月，很多地方都在上街游行，闹事，与警察冲突，发生大街上的流血。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把文革和这样一些事情进行过比较，或者看成是类似的事情，或者认为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比如毛泽东主义的影响。

沈迈克：当然注意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不仅讲法国，也讲美国，也讲中国，但是他没有谈到这些“革命”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影响。问题是，即使他想说明这一点，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

徐友渔：国内这种书也翻译了三五本，我知道，就是西方跟中国当时的情况。

沈迈克：我发现了一件比较滑稽的事——1966年8月18日，北京这边一百万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前高喊：“毛主席万岁”！就在这同一天——英国的8月17日，披头士乐队（Beatles）在剑桥市哈佛大学正好举行一个演奏会，几万个年轻人在草坪上也在齐声高喊：We love you! We love you!

唐少杰：2003年春季，我在哈佛上过麦克法夸尔先生一学期的文革史课。这课有那么几个特点，就是哈佛比较重视，历史也悠久，上了很多年了。这门课作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就是哈佛大学规定的。一、二年级本科生七十几门课程中的一门。我看到大概有三、四百学生选修，其中亚洲裔学生居多，其实是华裔学生多，最后听课的都是从中国父母来自中国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学生。我感觉可能更多的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人士的后代。肯定地说，这些人士都受过某些坎坷、纠葛、挫折，他们非常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赶快好好地了解。说得难听点，就是我们的家庭、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父母怎么来到美国，怎么走向世界。我感觉差不多60%左右的面孔是亚裔的，至少韩国和日本的不多，欧洲裔的也不多。欧裔跟亚裔不同，他们说文革实际上是作为两大文化时代，一个是法西斯运动，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这样来了解的，而亚裔跟那个文革生活背景就可能有关。麦克法夸尔讲得非常热闹，他曾带着军帽，带着红卫兵袖章，来渲染讲课气氛。他曾是英国BBC记者，文革初期来过中国，拍过电视录像片。在课堂上，他临时高喊“毛主席万岁”，调动大家的情绪，就如徐友渔说的，坐在课堂前面的二十几位麦克法夸尔的助教，一块儿满教室里奔跑，把大家的情绪发动起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叫啊，喊啊，想让学生跟着他们一起做。但是，那些学生都很麻木，都不跟着喊，麦克法夸尔教授是挺失望的，以前的听课学生可能还有所谓的激情，容易让他们了解文革群众运动的情绪，而现在没有了，所以越是往后教，其实越是对到了美国去的中国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来说，文革的整体形象可能越模糊，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吴迪：大家谈的是历史研究，我想说一说文革的文艺/文化研究。这和我治学经历有关，刚开始我搞的也是历史，内蒙古的文革史，参加过王年一老师主编的《文革大辞典》。后来因为环境、生计所迫，不得不转到影视方面。电影是第七艺术，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语言，甚至风俗等文艺和文化现象密切相关。而文革，首先革的是文化的命，所以，我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比较关注。总的说来，从文革结束至今的三十年间，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但是有盛衰，有起落。据我粗浅的了解，文艺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四人帮”倒台至80年代初，那时候的学界还没从文革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文章很多，但质量不高，控诉多于分析，愤怒压倒理性，所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政治性很强，学术含量很低，可取之处是提供了一些史实和亲历者的感受。有真知灼见的只是个别的文章，如1979年《文学评论》发表的钟惦棐的《电影文学断想》，1980年赵丹在病榻上写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1987年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一些章节，1988年谢冕出的《文学的绿色革命》，1988年王元化谈样板戏的文章，1989年《钟山》发表了三篇文章——潘凯雄、贺绍俊的《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木弓的《“文革”的文学精神——民众理想的辉煌胜利》，王干的《重读〈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1990年《当代电影》发表的王士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叙事/意识形态话语》。1992年《青年思想家》发表的于东升的《孤寂而冷漠的花朵——且说样板戏》，1993年《齐鲁学刊》和《飞天》上发表的刘火写的《白驹与白大共演的悲剧——论“文革”的文学精神》和李新宇的《“文革”诗歌略论》等著述代表了这一阶段的成果。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注重理性分析和历史流变，在理论上开始超越了正统思想的藩篱，借鉴了西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文革的文艺研究到这时才算步入学术轨道。但是，由于政经的双重压迫，这一阶段出来的东西很少。第三阶段是上世纪末至今，大概是政治上有限多元，经济上接近小康，有责任感的关心文革的学人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批很可观的成果。就我目力所及，文学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张明、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选照》，近年来高校出的当代文学史也都写到了文革，其中最理论深度的当推北大的洪子诚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的所有著作我都看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问题与方法》，《关于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都是启人心智的力作。这一阶段学界的视野也宽广了，从小说到诗歌，从文论到美学，从分析官方作家到梳理民间创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字；姚楠《“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丁茂远的《论郭沫若“文革”期间诗词创作》，杨汉云的《红卫兵诗歌概说》，王家平的《“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简论》，胡

有情的《论文革批评模式》，孙兰的“三论‘文革’文学审美价值体系”，干脆对浩然创作的研究，高有鹏对“文革”民间文学的探讨，黄擎对文革文学的叙述学研究都可圈可点。戏剧方面，样板戏研究是一大热门，我看到的博士论文至少有四部，1998年刘艳写的《样板戏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语境》，1999年韩国人卞敬淑写的《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研究》，2001年姚丹写的《从小说〈林海雪原〉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对当代一个文学现象的个案考察》，2002年祝克懿写的《样板戏话语的语言风格研究》。可贵的是，人们对文革文艺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文革，而是将十七年与文革联系起来，这方面傅谨的《“反思十七年”与中国戏剧的当代发展》有相当的深度。音乐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在写了《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写了《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2002年他报的研究课题是《中国“文革”音乐史》。比起

文艺研究，文革文化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大概是因为文化这个东西既包罗万象，又琐碎零散，资料难觅，不好下嘴。1993年周星写的《文革中的民俗现象》恐怕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社科院文研所的王毅大概是贡献最大的，他在1996年就完成了一本大书《文化大革命与原初文化》，可惜至今没能出版。我看到只是其中的一章《横扫牛鬼蛇神》成为文革纲领的发展过程及其文化渊源》，收在2004年香港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一书之中。还有何言宏的《“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金立鑫《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也都有独到之处。我举的这些例子不包括海外和港台，都是国内成果，当然是挂一漏万。但是就从我所了解的这一个小小的局部来看，也可以说，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文革的文艺/文化研究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形势大好的第一个标志是，关心文革的学者多了，研究的范围广了，思考得深了。形势大好的第二个标志是，官家对这类研究不那么神经过敏，有些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所在学校的支持，不但可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经济资助。戴嘉枋的《中国文革音乐史》被列入北京市教委的课题，获得了北京市教委数十万元资助，黄擎的《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被列入浙江社科联2004年度重点课题，得到了省级社会科学著作出版资金的资助，第一位研究教育革命的周全华的著作，也是得到了广东方面的资助的。当然我

们在看到成绩、看到光明的同时，还要保持清醒，有点自知之明——官方资助这类课题，很可能是地方主义、教育跃进、追求业绩、政出多门的结果，而不是人家真的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此受惠者只是极少数。

我对国外的有关研究不了解，这方面得请教迈克。我只知道有一个英国学者在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我，拿他的博士论文让我看，他研究的是内蒙文革中的大批判语言，用的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可是一看论文就傻了——作者对内蒙文革不了解，对当时的语言也不清楚，硬用西方语言学来套。我费了很大的劲看了他的论文的缩写本，给他提了意见和建议。我以为他的论文通不过，没想到人家很轻松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我还是有点奇怪，他的指导教师为什么会同意这位英国学生写这个题目，作为导师，他了解文革吗？他了解文革语言吗？如果不了解，他怎么去指导这种论文？

沈迈克：这事我知道，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愿意表态，我暗示了一下我是否定这个论文的。我对他的看法，跟你刚才说的大同小异。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个人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劲。最后这个论文通过了，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也出版了。这就说明，在我们欧洲、北美大学的一些指导博士生的教授，他们自己的水平恐怕也不太高。

崔卫平：今天上午这个单元的第二阶段开始，下面有几位学者做主题发言，他们是叶维丽、陈东林、何蜀。刚才商量把徐海亮先生的话题放到下午去，那么我们上午时间就更从容一点了，马上就按序进行他们的二十分钟的发言之后再讨论。好，那下面先请叶维丽教授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报告。

叶维丽：卞仲耘在文化革命开始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第一把手。1966年8月5号下午，她和另外四位校领导一起，在校内遭到一些学生的殴打折磨，卞仲耘不堪摧残，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当时知觉丧失，屎尿失禁。大约在一、两个小时之后的傍晚时